



“大奏鼓”之名考 从闽南迁徙到非遗名录的渔家狂欢

●孙江海

作者简介: 孙江海, 高级导演, 任总导演、总制片人的影视作品达1399集(部)。1972年2月参加工作, 从艺50多年。原温岭剧团文工团小生, 曾饰演十多部舞台剧目。1983年任温岭文化馆群文干部。1989年10月, 被浙江省人事厅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省直文化系统。1995年创建浙江教育电视台(现为浙江电视台教育频道)孙江海名家工作室。2000年创建孙江海导演创新团队。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戏曲影视传播研究所所长、研究生行业导师、文学院特聘教授。

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, “大奏鼓”从1985年确定汇编入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, 已成为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, 被誉为“中国渔村第一舞”。2008年, 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 此后更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暖场演出中亮相, 声名远播。今天, 而鲜有观者与研究者追问: “大奏鼓”之名从何而来? 它是否渔民口耳相传的自然称谓? 如果是, 为何在福建惠安、泉州等闽南文化原乡找不到同名舞蹈? 如果不是, 这一名称又是在何种历史情境下, 由谁赋予的?

本文旨在剥离“非遗”标签的既定印象, 还原这一名称从民间土语到学术定名的真实历史现场。研究将表明: “大奏鼓”之名并非古称, 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编纂工程中文化工作者的知识产物。40年前(1983年—1985年), 这一命名过程中, 深刻反映了民间艺术在进入国家非遗体系时, 从“地方性知识”向“学术术语”转化的内在逻辑, 也是研究者生活积累经验的创作灵感来源。而此, 也得到了浙江省文化厅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(浙江卷)编辑部, 在1985年、1986年、1991年, 三次颁发给本文作者荣誉证书。



1989年, 作者带领浙江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石塘镇拍摄“大奏鼓”。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, 已故庄道春等老渔民表演“大奏鼓”。



1986年,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(浙江卷)编辑部颁发荣誉证书, 表彰作者在《大奏鼓》民间舞蹈编纂工作中做出的贡献。

定名史 40年前的文化 正名与学术转译

要解开“大奏鼓”之名的由来, 必须追溯其随闽南渔民北迁的历史。明末清初, 福建惠安、泉州等地因海禁、瘟疫与族群冲突, 大量渔民向北迁徙至浙江温岭、玉环、舟山一带。据《福建·惠安县志》与《琅玕陈氏宗谱》记载, 箬山陈姓渔民于十七世纪中叶由惠安迁入。这批移民不仅带来了闽南建筑风格与妈祖信仰, 也带来了原乡的民风民俗, “大奏鼓”的前身即由此传入。

“大奏鼓”作为标准学名确立于1984年底。笔者当时接受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(浙江卷)编辑部布置的任务, 研究国家85艺术科研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编纂工程, 这是国家“七五”跨“八五”艺术科研重点项目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, 作为温岭县文化馆干部, 笔者受命承担本地民间舞蹈的抢救挖掘、收集整理工作。这一研究在抢救挖掘、收集整理过程中实际上涉及当地的地域文化、海山文化、道士文化、民俗文化, 以及对地方老艺人与闽南话文化, 还有对石塘多年生活体验获得的灵感, 也是对渔民豪爽粗犷个性化的佐证。尤其是已故老艺人庄道春(第二代祭祀活动领舞者, 当地人都称他为“摇脚阿洒”)的形象, 今天还能够清晰地想起来, 并感受到渔民那种对生活祈求平安的重要性; 家人盼望出海捕鱼的男人能够活着回来, 盼望着能够多捕鱼的心愿; 盼家里的生活能够富裕起来, 盼年年风调雨顺, 盼五谷丰登; 盼“日子一年好一年哦”——这是石塘“小年”的一个民俗舞蹈活动“跳火”过程时, 用闽南语常说的一句话。以上多重互动形成的表达语汇的启迪, 给了笔者许多养分和土壤。

“大奏鼓”的核心古称及其文化意涵

在闽南移民的民间语境中, 这一民俗活动存在多个称谓, 各有侧重。当时, 这些老艺人不肯来表演, 他们推脱说: “做这个事很难为情。”还有位老人说自己是道士, 这是在祭祀法度时搞的民间活动。这在当时的环境下, 带有一定的神秘性。这就让作为群文干部的笔者心里, 面临着难题和顾虑障碍: 难道要去抢救和研究一个道士文化吗? 难道这就是民间舞蹈吗? 难道温岭石塘就只有这一种民俗活动吗? 那么, 如何将道士文化转化为符合学术规范的民间舞蹈名称呢? 这些思考和疑问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。矛盾的心里、疑惑的问题, 始终缠绕着大脑, 就连吃起饭来也没有味道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起, 我在温岭剧团工作了10多年, 每年上山下乡演出都会到上马、钓浜、箬山、石塘、吞环等海边乡村演出, 生活体验极其丰富; 再和我已故石塘文化站林应刚同志, 一起深入福建泉州调研的学术研究支撑, 导致对这一民俗的定名逻辑与民间活动主体结构定位, 如何匹配民间舞蹈元素产生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考量。

一是如何去地域化? 原名之一的“车鼓亭”地域色彩过浓, 且易与北方“车鼓”混淆, 不利于跨区域传播。尤其对“道士祭祀”分寸的把握。

二是如何突出核心特征? 该舞蹈“全为打击乐、无唱无念、鼓声为大”, 且动作粗犷。

三是“大”字概括了其规模与气势, “奏”字强调了“边奏边舞、乐舞一体”的独特形态, “鼓”字锁定其灵魂乐器。

四是唯一的渔村特色乐器“乳钟”得以保留下来, 有乐器齐奏感。可惜石塘老艺人失传了核心的乐器——“压脚鼓”(目前, 已在泉州得到保护, 为国家级非遗)。

五是艺术标准化的需求, 为符合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的编纂体例, 需要一个中性、规范且能体现艺术本体的学名问题, 就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。

六是温岭石塘渔船出海, 船上都要升起一大一小的船帆, 借助风力推动船的速度, 给予启示。想到在海滩表演区场地, 升起两个帆船, 主题思想上面可立八个大字

“独占鳌头, 满载盈归”。“盈”字是不规范的, 但是它代表了当地捕鱼人的心愿, 战胜海洋, 捕鱼多, 温岭方言“又盈哦”。

七是取名思路要为民间舞蹈主题服务和主题思想的提炼。我多次请示当年最具权威的浙江省舞蹈家协会主席郭桂芝同志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(浙江卷)编辑部副主任何惠芳同志, 二位专家给予极高评价。

“大奏鼓”改名, 向原县文化馆馆长叶祥土、副馆长郭修琳以及韩伟老先生汇报。在撰写“大奏鼓”历史沿革之前, 确定以“大奏鼓”之名定名, 编入研究材料。送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·浙江卷》出版前, “大奏鼓”之名的全部手稿材料顺利通过省、国家专家们的审核。温岭“大奏鼓”终于完成了它从地方俗名到国家学术名录的历史跃迁。至此, “大奏鼓”之名被正式确立, 并载入1990年出版的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·浙江卷》。

从“车鼓亭”到“大奏鼓”, 不仅是名称的更替, 更是这一民间艺术从地方仪式进入国家非遗体系的大礼。

非遗语境下的身份重构

“大奏鼓”更换定名过程的本质, 是民间艺术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时发生的符号转换。这一转换带来了身份与功能的深刻重构, 体现了非遗保护中“专家话语”对“民间话语”遗产化的生存策略。对于地方而言, 接受“大奏鼓”这一标准化名称的转变是其现代生存策略的一部分。

(1) 从“娱神”到“娱人”

原名“车鼓亭”“大典鼓”紧密依附于妈祖信仰与宗族祭祀, 功能是“娱神”。而“大奏鼓”则被重新定义为“渔村丰收舞蹈”, 其展演场域转向舞台、广场与电视荧屏, 功能是“娱人”——服务于旅游展示、文化庆典与国家仪式。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的暖场演出, 即是这一功能转换的典型例证。

(2) 知识权力的转移

名称的变更意味着解释权的转移。老渔民口中的“车鼓亭”是渔村的地方性知识, 其意义由参与仪式的共同体成员共享。而“大奏鼓”则是文化研究赋予、可被外部世界理解和分类的学术标签。这一过程体现专家们有权判断什么是“舞蹈”、什么是“民俗”、什么值得被“保护”。

(3) 遗产化的生存策略

1989年10月、1990年2月及1991年正月十六, 我那时已调到省里工作, 在浙江电视台严家树老师的指导下, 三次带摄制组前往石塘, 拍摄了《渔村的节日》《海·石头·人——石塘行》等作品。欣慰的是, 30多年前的编导手稿找到了(已捐给温岭市档案馆)。拍摄期间, 我曾再次邀请庄道春老朋友以及其他几位年长的老渔民表演“大奏鼓”, 却发现他们年事已高, 力不从心, 舞蹈动作和神韵已显流失。我意识到, 这一民间艺术亟需重视与传承。我前后多次去箬山乡文化站找当时的文化员陈其胜同志, 谈了不下五六次, 希望他有责任向老艺人学习, 主动做好保护工作。因那个年代地方上还没有高度关注, 他也缺乏积极性, 一度希望调离箬山乡, 最好调到县里工作。我强调: “作为箬山乡唯一一位乡文化员, 调县里不现实。在工作岗位上一天, 就有责任先向老艺人学会跳。”对于地方而言, “大奏鼓”这一标准化名称, 获取国家级非遗身份, 也激起了年轻人传承的兴趣。

温岭民间舞蹈“大奏鼓”, 从1983年初开始挖掘救治到2008年, 整整经历了25年, 终于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。随之而来的是政策支持、资金倾斜与品牌效应。可谓名称的转变不是被动接受, 而是主动的生存策略——以“正名”换取“合法性”, 以“标准化”换取“资源化”。

激活“大奏鼓”之名的基因

激活“大奏鼓”之名的基因, 就是解码温岭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的“活化石”。它们必须被重新“命名”、被“分类”、被“传承”, 才能进入“国家遗产”的名录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 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——尽管这种新生命, 可能与原初形态有所不同。

“大奏鼓”之名由来, 是一场成功的“文化生产”与“知识构建”, 赋予了这项源自闽南的移民艺术以清晰的现代学术身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舞集成工程, 以其学术研究完成了对这项民间艺术的“命名洗礼”; 更是命名背后交织着学术规范、地方诉求与国家话语的多重力量。这一“改名”案例也提醒我们, 非遗的名称从来不是中立的, 它是历史产物——从“车鼓亭”到“大典鼓”, 再到“喂喂鼓”, 最终到“大奏鼓”, 每一个名称都沉积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。

期待温岭下一个百年, 续写“一群娃的闪光, 一座城的坚守”, 让“大奏鼓”文化深耕校园、薪火永续传承。

命名的双重动力

原有的方言称谓无法直接进入这一体系, 必须经过“翻译”与“转写”。地方动力则来自群众文化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。这个更改定名不仅完成了名称的转换, 对舞蹈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提炼——以“独

占鳌头, 满载盈归”为立意, 将其定性为“庆祝渔业丰收时跳的民间舞蹈”。这一主题定位既符合渔民的心理期待, 也契合国家对民间文艺“健康向上”的价值要求, 更回避了“道士活动”。



2026年春节期间, 在石塘里箬村, “大奏鼓”巡街表演引来众人围观。记者 徐伟杰 摄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, 均由作者提供)